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高校思政教育 数字化政策文本分析

毛伟^{1,2}, 廖丽强¹, 李白雪¹, 向诗蕾¹, 徐小怡¹

(1.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2. 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 基于2012年11月以来的97份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为样本,构建X-Y二维分析框架,分析相关政策的政策工具分布及政策实施。研究发现,文件类政策较多,法规类政策较少;发文机构单一,协同类政策不多;政策工具体系初成,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政策工具的应用持续向好,政策工具与政策实施的默契不足。最后,从强化法律法规支撑、加大政策协同力度、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实施的匹配度等四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关键词: 思政教育数字化; 政策工具; 政策文本; 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14-0086-07

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下,高校思政的地位不断加强。“Z世代”大学生思想活、观念新、兴趣广,易被个性强的新兴事物吸引,且深受数字产品和技术的影响。思政课的本质在于说理,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群体,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1]。当前,数字技术已全面融入社会的各领域及全过程。为精准把握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更好地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思政需善用数字技术,助力“大思政课”的课堂大、视野宽、内容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并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部也将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列为2022年的重点工作。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过程中,应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机遇,推动高校思政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2]。

虽然思政和数字化的研究成果都非常丰富,但直至党的十九大之后,思政与数字化相结合的相关研究才开始活跃起来^[3]。总体来看,思政数字化政策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现有思政数字化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思政和数字化的协同发展^[4]、数字化赋能思政课的路径^[5]、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思政课的评价创新^[6]等三方面。从高校思政的政策研究来

看,研究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①发展特征。基于演变特征^[7]和发展趋势^[8],分析高校思政政策的发展特征。②教材建设。从大中小学思政教材一体化建设^[9]和思政辅导教材建设^[10]两方面,探讨思政教材体系的构建。③教师队伍。从队伍建设的问题^[11]和教师素质^[12]出发,分析思政教师队伍建设。从政策工具法的应用研究来看,政策工具法广泛应用于地方人才政策^[13]、应急管理政策^[14]、知识产权政策^[15]等政策量化研究中。但是,运用政策工具分析高校思政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极少,相关研究聚焦于两类:一是政策的量化分析。从政策的演进、特征和工具三方面,探讨高校思政工作政策的内容^[16];或者基于政策工具-内容二维分析框架,分析高校课程思政政策应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17]。二是教师队伍建设。基于政策内容,解析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特征^[18]。

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对高校思政政策进行了大量探讨,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定性角度对高校思政政策进行宏观经验性总结。近年来,虽然“思政教育数字化”这一前瞻性话题愈发受到重视,也有少数研究通过政策工具分析高校思政工作政策,但鲜有对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进行系统量化分

收稿日期: 2024-03-26

基金项目: 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2228);广东海洋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202419);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E15174)

作者简介: 毛伟(1975—),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廖丽强(1998—),男,广东河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李白雪(2001—),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向诗蕾(2002—),女,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徐小怡(1973—),女,陕西蓝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

析。基于此,本文在政策工具视角下,构建政策工具和政策实践的二维分析框架,考察我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外部特征、政策工具的分布及其与政策实施的配合情况,以期对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优化提供建议,助力教育数字化战略在思政领域的深入推进。

1 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分析框架

为达到某一政策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即为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分类不一而足,通常有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三类。以政策工具为基础,结合思政数字化的实施,本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实施”二维分析框架(图1),分析政策文本的内容及政策工具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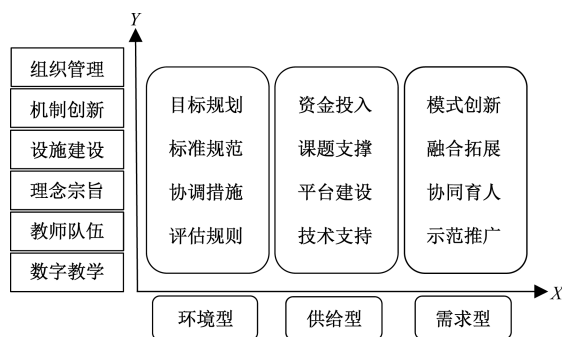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1.1 X 维度: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借鉴陈良雨和段旭萍^[19]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本文将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条款分为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三类。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目标规划、标准规范、协调措施、评估规则等,以便有序推进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提供资金投入、课题支撑、平台建设、技术支持等;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通过模式创新、融合拓展、协同育人、示范推广等措施推动高校思政课插上数字化翅膀,以便在数字化时代上好思政课。

1.2 Y 维度:思政教育数字化实施维度

政策实施不仅反映了政策顶层规划设计、引领的理念和方向,还决定着政策在执行层面落实的方略和质量。为进一步揭示思政教育数字化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律,从政策工具执行层面出发,引入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分析的另一个维度——政策实施维度(Y 维度)。综合来看,尽管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但是可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两类。据此,结合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具体内

容,将政策的实施维度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共6个因素。其中,外部环境是政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根据政策执行偏差外部决定论,政策执行偏差的主因是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组织管理、机制创新和设施建设三个因素;内部因素是指在系统内部影响和制约思政教育数字化实施效果和功能的因素,主要包括理念宗旨、教师队伍和数字教学三个因素。具体来讲,组织管理是指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规划、统筹、开展、监管等;机制创新是指为提高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效率和质量,而对相关体制、机制进行重构和创新;设施建设是指为开展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而对平台、设备、设施、授课资源等软硬件设施及资源进行投资和建设;理念宗旨是指政府及管理部门对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观念、看法、态度,以及相关的目的和意图;教师队伍主要指在推动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中,对师资力量培养、建设和引进;数字教学主要是指思政教育数字化教学培养的目标、方式、环节、教改等方面。

2 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文本分析

2.1 政策文本的收集与统计

2.1.1 政策文本的收集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教育的成效卓然,相关政策不断完善,相关研究不断丰富^[20],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不断推进^[21]。因此,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12年11月8日至2023年12月31日。检索对象包括中央及各部委网站和北大法宝,不含省级(含)以下部门颁布的政策。检索关键词为“高校思政(思想政治)”和“数字化”。政策文本的遴选标准有两条:一是政策应对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提出相应的目标、内容和保障措施,而非简单提及;二是政策的类型多样,包括规划、方案、意见、通知等。由此,共挑选97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相关政策作为研究样本,且按照政策颁布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政策文件进行编号,如表1所示。

从政策的效力位阶来看,近九成的政策为文件类型,法规类政策占比仅为6.2%。现有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仅包括包含有1份行政法规、87份部门规章、6份党内法规制度、3份团体规定。政策效力位阶的结构表明法律法规类政策的支持不足。教育部无疑在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主体作用,但是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是一项涉及面极大的系统工程,而且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决定

表 1 2012—2023 年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文件

序号	政策名称	发文部门	发文时间	效力位阶
1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教育部	2012. 11	党内法规制度
63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	2013. 01	部门规范性文件
66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同意作为全国革命文物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融合发展论坛指导单位的函》	国家文物局	2021. 09	部门工作文件
80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教育部	2021. 11	部门规范性文件
97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3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 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2023. 03	部门工作文件

注：限于篇幅，只列举部分政策。

了中央各部委的管理特征是细化型“条块分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也不断得以弘扬。在教育部难以单独处理技术、财政、服务等领域事务的背景下，为充分支持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执行，亟待通过法律法规来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保驾护航。

2.1.2 政策文本的统计

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发文时间统计如图 2 所示。从政策发文时间来看，在样本期间，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发文数量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12 年发文量最少，仅 1 份。2017 年和 2019 年发文量最高，达 17 份。2015 年之后，每年的发文量都维持在 7 份及以上。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2016 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政工作需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国高教事业的新局面由此打开。有鉴于此，结合相关政策的发文量和政策主题，将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划分为萌芽期和成长期两个阶段。

2012—2016 年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萌芽期。萌芽期政策多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

策主题围绕着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理念宗旨、组织管理、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初步设想，为后续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推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17—2023 年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成长期。这一阶段既按照萌芽期提供的方向稳步推进了思政教育数字化，又对相关政策进行了细化和拓展。成长期的重心在于思政教育数字化新生态的建设及其实践，在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服务平台、创新活力和技术效能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践行，思政教育数字化的多向交互和分众化发展得到有力推动。

从发文机构来看，参与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制定的机构众多，包括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等 19 个机构。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发文机构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思政教育主要由教育部来组织，但为了确保政策的顺利落实，相关部门的参与和协同必不可少。教育部发文数量最多，占比超过 91%，这反映了教育部是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核心机构。尽管因职能所在和思政教育的性质，在教育部牵头下制定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相关政策理所应当，但这也体现出教育部和其他机构的政策协同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国家文物局和共青团中央政策发文量占比近 10%，表明这两家机构积极配合和推进了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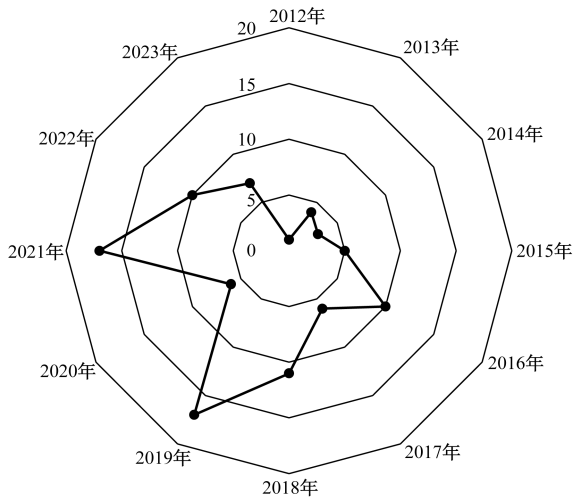


图 2 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发文时间统计

表 2 政策颁布机构的数量统计

序号	发文机构	总数/篇	占比/%
1	教育部	89	76.07
2	国家文物局	5	4.27
3	共青团中央	4	3.42
4	中共中央宣传部	2	1.71
5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	1.71
6	财政部	2	1.71
7	中共中央办公厅	1	0.85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	1	0.85

注：总数包括单独和联合发文的数量。

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财政部政策发文数量相等,三者发文总量超过6%,这三家机构从宣传、技术和资金上保障了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其余13家机构发文量仅颁布1条相关政策,这反映了相关机构虽对思政教育数字化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偏弱的协同力度抑制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2.2 政策文本编码

为深入分析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内容,采用“序号-条款-条目”的方式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具体来讲,“序号”是指通过数字“序号”的形式对政策进行编号,政策“序号”。“条款”是指按照在政策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对政策内容的条款通过数字的形式进行编号。“条目”是指按照在条款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对条款所含的具体条目通过数字的形式进行编号。例如,编码“5-1-3”则表示“第五个政策中第一个条款的第三个条目”。按照上述方式对97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政策文件进行编码,共得到199个编码单元,如表3所示。

基于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在“X-Y”维度上对表3的政策编码进行分类统计。例如。编码“1-6-1”的内容“会同有关部门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开展优质数字化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在政策工具维度(X维度)和思政教育数字化实施维度(Y维度)上,它分别属于需求型政策工具和设施建设维度。对编码进行分类后,再分别统计“X-Y”维度上每个政策工具编码数量的占比(%),二维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2.3 二维特征分析

2.3.1 维度分析

由图3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综合运用了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三大类政策工具,这表明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工具的类型齐全,从不同角度促进了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实施。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反映了某一阶段政府的政策偏好和发展重点^[22]。从结构来看,思政

表3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部分)

序号	政策名称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	编码
1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会同有关部门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开展优质数字化专业教学资源建设	1-6-1
49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优秀成果巡礼活动的通知》	教育部门户网站开设“高校思政课建设优秀成果巡礼”专栏,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高校在加强思政课建设进程中涌现出的优秀成果和先进典型	48-2-1
97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针对高校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思政课实践教学等进行深入研究	97-1-2

注:限于篇幅,只列举部分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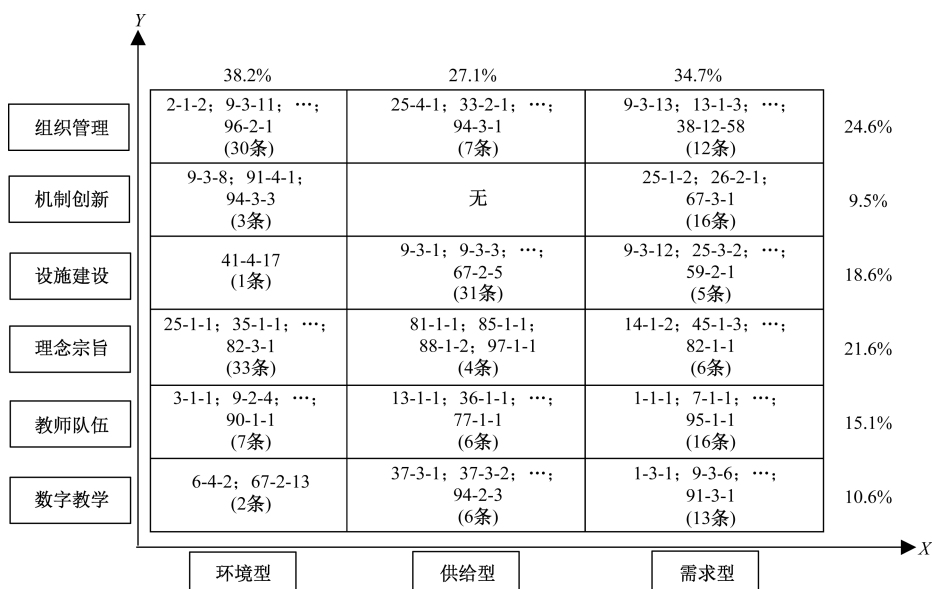


图3 政策条目二维统计

教育数字化政策工具的结构并不合理,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政策工具的组间结构失衡。环境型政策最多,占有政策条目总数的38.2%;需求型政策的数量位居第二,占比为34.7%;供给型政策最少,占比为27.1%,这表明在推进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中,政府相关机构更强调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而对供给型政策工具较为忽视,政策工具结构存在组间失衡的现象。其二,政策工具的组内结构失衡。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例,虽然其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占比最大,但其组内政策要素的使用频次两极分化。其中,仅理念宗旨和组织管理的使用频次超过两位数,其余政策要素使用频次均不及上述二者的25%。如果同一政策工具的组内使用比例差异悬殊的话,会严重影响该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进而降低所有政策工具的整体效果。

从政策工具所包含的内容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主要对象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准备工作,多用于发展阶段与目标、衡量标准体系、部门间协调规则等。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最高,反映政府在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政府主导作用。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涉及教育、技术、人才等诸多领域,需要统筹教育与产业、财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既需要教育部的纵向推进,也需要机构之间的横向配合。在中国现行管理体制下,政府对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环境的构建必不可少。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对象为高校思政数字化中的保障工作,多用于编制经费奖励方案、设立思政立项规定、提供相关信息网络技术等。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少的可能原因是,目前,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此外,中国教育及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这使得现阶段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鼓励先行先试,在探索中创造条件。供给型政策工具能有效引导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推动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普及,提升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质量。可见,供给型政策工具偏少不利于扩大有效供给和促进资源整合。“重环境型政策工具、轻供给型政策工具”造成政策工具组间结构失衡,这并不利于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对象为高校思政数字化的深化工作,多用于教学模式创新、多元素融合拓展、优秀案例示范推广等。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占比超三成,且仅比排名第一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低3.5%,这反映了高校思政数字化业已渡过了起步

阶段的外生引导期,现阶段逐渐形成在内生动力推动下的自觉行动。计划经济下的“拉郎配”方式逐步被服务型政府所摒弃,市场机制在高校思政数字化过程中渐具规模。

2.3.2 Y 维度分析

从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实施维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政策在组织管理、机制创新、设施建设、理念宗旨、教师队伍、数字教学等6个方面对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进行了全方位干预,这表明政策工具齐全完整,覆盖了思政教育数字化各个环节。对数字化政策实施的各个子维度进行对比,发现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实施主要集中在“组织管理”(24.6%)和“理念宗旨”(21.6%),其次为“设施建设”(18.6%)和“教师队伍”(15.1%),而“数字教学”(10.6%)和“机制创新”(9.5%)则应用较少。

在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政策体系中,组织管理和理念宗旨在政策实施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设施建设和教师队伍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对数字教学和机制创新缺乏应有的重视,尚难以将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和高校思政工作有机地融合起来。政策执行和变革环节的比重较低,不利于通过激励机制调动政策客体参与的积极性,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重管理和设施、轻技术和实践”的状态。

依据国家对高校思政数字化的部署,为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首先要通过突出“组织管理”和“理念宗旨”来落实政策。“组织管理”和“理念宗旨”这两类政策工具运用最多,反映了政府对高校思政数字化绝对的主导作用和强烈的态度意愿,政策导向作用突出。现代信息技术有力推动了高校思政课改革,为实现技术和思政的融合,需要加强平台及教师建设^[23]。目前,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围绕宣传教育、思想引导、社团管理等方面开展了数字化平台建设。党的二十大的“教育数字化”战略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思政课教师熟练掌握数字化技术,创造性地实施灵活多样的教学。数字教学和机制创新是思政教育数字化落实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两项政策工具的应用都相对较少,这为未来政策优化的重心指明了方向。

2.3.3 X-Y 维度的匹配度分析

一个操作性强、效果好的政策,必定是同时兼顾了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从纵向来看,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的匹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在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萌芽期,政策的发

文量较少。同时,由于缺乏经验,政策实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在政策的萌芽期,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的配合度较低,尚处于不断磨合的阶段。在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成长期,不仅政策的发文量大幅增加,而且政策工具更加丰富,政策实施要素的分布也较前期更为均衡。同时,政策的萌芽期也为后续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的配合积累的大量经验。在此阶段,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的配合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从横向来看,一方面,尽管在某些领域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的匹配较高,但是也存在一些盲点和短板。例如,机制创新与供给型政策工具没有交叉项,表明供给型政策工具并未在机制创新中应用,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的匹配存在盲点;设施建设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仅有一项交叉,表明环境型政策工具在设施建设中的应用极少,这表明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的匹配还存在一些短板。

3 未来政策优化策略

(1)强化法律法规支撑。相对于通知、办法、意见,法律法规的效力位阶和权威性更高,更有利于政策的顺利实施。首先,构建法律支持体系。在政策的设计、执行、监督等环节,积极进行立法,努力通过形成法律支持体系,加强政策执行的规范性和法律效力。其次,增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法律意识。组织相关机构与个人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相关法律法规,熟悉机构与个人的权利及义务,并主动关注并参与法律实践,以便增强对思政教育数字化相关法律的体验和理解。最后,加强法律宣传。一是拓展宣传渠道。不仅要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渠道进行宣传,而且还要通过直播、短视频、自媒体等现代渠道进行宣传。二是细分宣传内容。针对不同对象和领域,精细化设计宣传内容,以多元化的内容应对宣传受众的分众化。三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机构与个人的协作,加大宣传的合作、投入和深度。

(2)加大政策协同力度。政策的执行和保障相辅相成,完善的配套政策体系能为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首先,倡导权威性、高级别的非教育类机构增加对思政教育数字化的发文,促进思政教育数字化的实施。其次,加大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宣传,进一步加强对教育数字战略的重视,邀请更多的机构参与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具体来讲,既提倡非教育部门就思政教育数字化单独发文,更鼓励非教育机构

积极与教育部联合发文,强化各个政策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联动。最后,建立理事会制度,推动政策主体联合办公,加强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协同性。通过政策协同发力,突破机构之间细化型“条块分割”的行政桎梏。

(3)优化政策工具结构。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的作用各异,结构合理的政策工具是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重要保障。首先,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引导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普及,提升思政教育改革的质量。其次,加大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在经济发展和教育数字化实践的基础上,分阶段运用供给型政策工具,扩大有效供给和促进资源整合。最后,构建激励机制,调动政策客体参与的积极性。一方面通过教改项目和教学绩效,引导教师加强对思政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思考和实践。另一方面,将思政教育数字化纳入教师日常考评体系,推动思政教育数字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4)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实施的匹配度。首先,合理分配政策要素在政策实施维度的分布。将管理、评价和监督纳入数字教学的各个环节,根据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教学内容和过程,促进政策要素在实施端的均匀分布。其次,完善政策工具与政策实施的匹配度。一是扫除政策工具与政策实施匹配的盲点。增加供给型政策工具在机制创新中的应用,不仅要关注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资金、项目、平台等单项的机制创新,也要推动供给型政策工具综合使用系统的创新及重构。二是补齐政策工具与政策实施匹配的短板。在设施建设方面,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思政教育数字化的软硬件设施及资源,明确设施建设的标准、措施和监督。在数字教学方面,通过细化思政教育数字化教学培养的目标、方式、教改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提升思政教育数字化的教学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 [1] 赵丹.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N]. 中国青年报, 2024-03-19(003).
- [2] 欧达宇, 许欢.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建设政策的推进逻辑与未来进路[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4): 94-101.
- [3] 董福祥. 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研究——评《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探》[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16): 255.
- [4] 胡刚. 人工智能促进高校思政课范式转换与话语生态重

- 塑协同发展探赜[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3, 41(3): 136-142.
- [5] 豆素勤, 王强. 数字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特征、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J]. 学术探索, 2023(2): 149-156.
- [6] 谢幼如, 邱艺, 章锐, 等. 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进路与评价创新[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9): 7-15.
- [7] 沈元军, 刘力波.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策的“变”与“不变”[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21): 34-37.
- [8] 蒙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政策的创新与发展[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1): 70-76.
- [9] 张桐, 朱新华.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政策历程与发展方向[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3(41): 24-27.
- [10] 肖尚军.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教材建设: 政策、逻辑与路径[J].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3(1): 7-10.
- [11] 雷冬艳, 罗英.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2023, 26(2): 11-16.
- [12] 孔宪峰.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素质结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分析的视角[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23(4): 89-101.
- [13] 王娟, 夏后学. 南京市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基于创新型城市政策文本比较分析[J]. 科技和产业, 2023, 23(19): 115-121.
- [14] 谢敏, 张梦云. 政策工具视角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区应急管理政策文本分析[J]. 科技和产业, 2023, 23(2): 204-211.
- [15] 雷筱娱, 曾德超.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湖南省知识产权政策研究[J]. 科技和产业, 2022, 22(1): 74-80.
- [16] 杨杰, 彭均. 政策工具视角下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工作政策研究——基于129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3, 8(1): 26-36.
- [17] 郑宏宇. 高校课程思政政策工具使用图景及优化策略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3, 41(8): 141-147.
- [18] 李芳, 戴汶奇. 新时代十年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文本的研究分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12): 92-101.
- [19] 陈良雨, 段旭萍.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政策工具选择及运用[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5): 74-79.
- [20] 刘水波, 袁乙平. 高校思政课政策研究的凝视: 现实图景和未来展望[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5(9): 46-52.
- [21] 杨征铭. 高校思政课教学数字化的新机遇、新挑战与新路向[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2, 28(6): 61-68.
- [22] 张春花, 宋永辉, 李兴格. 三维政策工具视角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基于2008—2021年国家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J]. 中国高校科技, 2023(6): 81-88.
- [23] 王颖, 黎家成. 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优化路径探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8): 49-51.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Poli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MAO Wei^{1,2}, LIAO Liqiang¹, LI Baixue¹, XIANG Shilei¹, XU Xiaoyi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Guangdong, China;

2. Guangdong Coastal Economic Belt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Zhanjiang 52408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97 digital polic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since November 2012, an X-Y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ore policies for documents and fewer policies for regulations, a single issuing organization and not many synergistic policies. The policy tool system is beginning to be formed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policy tools is unbalanc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tools continues to be good, and the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olicy tool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is insufficient. Finally,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which are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reasing policy coordinati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and improving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digit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policy text; quantitative analysis